

考古学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陈 青 项聪颖 整理



英国人烧制的“中国风”瓷器（宁波博物馆供图）

海洋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

“一带一路”“海洋发展战略”等都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时代契机。今天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以法国水下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为例，法国水下考古目前已发现沉船1.9万艘。一条沉船可能有多少出水的文物？世界上著名的沉船博物馆——瑞典的瓦萨博物馆、英国的玛丽·罗斯博物馆、中国广州的“南海I号”博物馆和韩国的新安沉船博物馆，每条沉船的文物足够支撑一座博

物馆，其中“南海I号”出水文物超过10万件。由此推知，“海洋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当之无愧。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研究对象，现在能够确认的沉船有240多艘，相信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会有更多的沉船考古发现。“小白礁I号”是近年来水下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船上带有瓷器，有来自日本、越南、西班牙的银币，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见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尔德

马尔森号”沉船，1752年沉没，1984年打捞，货物清单如下：23.9万件瓷器、68.7万磅茶叶、147根金条以及纺织品、漆器、苏木、沉香木等，总价值80万荷兰盾。由此可知，从贸易额度、规模等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更为深远。

由于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从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东印度公司，因此中国瓷器上会出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随着中国瓷器大量出口欧洲，在欧洲逐渐刮起“中国风”。欧洲皇室贵族

以拥有中国瓷器为时尚，德国柏林夏洛特王宫的瓷器室（18世纪），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室（16-17世纪），所藏均为中国瓷器。在宁波博物馆一楼特展厅中有一件英国人烧制的瓷器，图案

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

（《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大展》在宁波博物馆一楼东临展厅展出，展期至4月8日）

主讲人名片

姜波 先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执行委员、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港口遗址考古与汉唐都城考古。



(宁波博物馆供图)

海上丝绸之路对现实生活影响深远

海洋贸易对于今天的生活影响深远，如我们熟知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发展而来的一种企业制度。舌尖上的味道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很多改变，如番薯、玉米、辣椒、咖啡等外来食品深受国人喜爱，从中国传出去的茶叶等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饮食风格。

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大陆第一次看到有人吸烟，百年之

后，烟草风行全世界。青花瓷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但青花当初却是伊斯兰文化的符号，唐代传入中国，由洛阳巩县窑烧制成瓷，经扬州出海，运至中亚地区。17至18世纪，青花瓷传到欧洲，欧洲人开始仿制。致远舰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写着“致远”的青花瓷盘，为英国瓷厂定制，又回到中国。这些都是文化流动的体现。海上丝绸之

路不是空洞的概念，它与生活密切相关。

从唐代到明代，中国的人口始终稳定在五六千万，这是当时土地的供应极限。但是明清时期，番薯、玉米引入中国，粮食产量得到提升，中国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总数超过4亿，即后来所称的“四万万同胞”。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

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有古代的中国人、波斯、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和后来的西方殖民贸易者。

古代人类开展海上交流，主要依靠季风和洋流，所以中国古代航海大多以一年为周期，进入印度洋需要在马六甲等风向往转换。郑和航海到印度洋、中东地区，两年为一个周期。基于季风

对航海的重要性，泉州这样的海港城市自古就有由官府主导的祭风仪式，祈祷出海旅途平安，我们今天远行时讲“一帆风顺”就是从此而来。

在古代航海史上，跨太平洋航行难度巨大。太平洋北部有个闭合的洋流圈，古人发现这个规律后，横跨太平洋航行才成为可能。大帆船贸易航线基本符合洋流方向，顺风、顺水，由此开启了约250年的繁盛的跨太平洋贸易，中国瓷器等货物从漳州等沿海港口经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什么样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到底什么样呢？它会有一系列与长安、北京、洛阳等不一样的城市布局，有海洋贸易的管理机构，有外交的馆驿等。

港口非常重要，所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需要去停泊一下。在泉州有一块“郑和行香碑”，碑上

刻有“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忽鲁谟斯等国公干”等字样，碑上提到的地名就是波斯湾湾口的忽鲁谟斯岛，这个地方现在仍然是交通枢纽。泉州当时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贸易港口，有很多人会说波斯语，波斯语是当时海洋贸易的公用语言，相当于现在的英语。

泉州还设立了专门管理海洋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至今还在。另外，泉州还有已清理出来、顺着晋江设置的码头。海上贸易的港口多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这是因为海外区域的风浪特别大，所以一般会在入海口朝里的地方设置贸易集散地，港口的旁边还会设置

一座小庙。我们曾到福建地区做调查，发现不管是渔民还是做海洋贸易的，上船之前或者下船之后，都会到庙里拜一拜，祈求平安。现在我们出门办事还经常会用到“拜码头”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在泉州、广州、宁波等海港城市，不难发现，那时接待外宾的地方多用“怀远”“柔远”“招远”等词命名，如果是军事对抗的地方如海防设施，大多会叫“镇远”“定远”“宁远”。

在泉州有一个埃及人的墓，上面写着“番客墓”三个字，这是外国人写的，因为三个字细看都是错别字。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的唐三彩——一个飞燕纹的盘，同样的东西在洛阳的唐墓中也有发现。所以，我们的唐三彩远涉重洋到了埃及，埃及人也到了中国，古代的双向交流是非常发达的。

（讲演内容来自宁波博物馆东方讲坛，有删节）

文物收藏，“乐”在哪里

顾 玮 吴中央 整理

收藏家也是有派别的

人类的收藏行为从哲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应该是和记忆、情感有密切关系，这个记忆可以从个人的范围一直扩大到国家、人类的范围。所以，收藏什么？是收藏记忆，也是收藏情感，收藏我们的文化发展、每个阶段的历程。

收藏跟时间有关系。你30岁的时候，可能就收藏一两件儿童时期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慢慢地，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可能变成某方面专门的收藏家，这需要时间。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时间，做学术研究也是一种收藏，收藏知识。

收藏家也是有派别的，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轮流转。他们会把一些收藏品进行轮转，也就是说收来的东西自己藏了一段时间后，再换出去，换成经济利益也

好，换成另外一些更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也好。有大量的收藏家是这样的。

晚清民初时的罗振玉先生，收藏非常丰富，可是也有资料显示，他实际上也做大量的文物生意。也就是说，东西到了他手里，初步研究以后，形成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写成非常重要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后，如果觉得这个藏品有利可图，或者哪个朋友非常喜欢，就拿来换钱或转让给他人了。轮流转最后能不能成为收藏家？按我的定义，就看他最后留下什么。比如罗振玉先生留下了他的学问，他就是收藏家，至今文物收藏界还是十分尊崇他。王国维先生研究经学和甲骨文，有一部分研究材料就是罗振玉先生提供的，因为他俩是亲家。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叫董康，是专门贩卖古籍的，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非常厉害。许多大学问家，甚至包括海外的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等机构，都和董康打过交道，从他手里得到过非常珍贵的古籍。他也著书，是关于自己经眼的古籍版本的判断。董康是不藏书的，他获得好的古籍后，翻一翻，可能写一段笔记，就放在那儿待价而沽。去年6月，我随饶宗颐先生到法国的一个学院参观，对方特意从库房里拿出一部分东西供观看，里面就有董康跟伯希和以及当时法国其他一些汉学家的书信来往。可惜100年不到，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董康是谁了，他至多也就是留给世人一个书贩子的印象。

我认为，在市场里非常活跃的那些轮流转不能算是收藏家，因为他们东西都散了。

第二种是中间派。这些人本



郑炜明向天一阁博物馆捐赠的雕版，内容及儒家思想、道教经典、民间生活等。此为清“除邪驱鬼，正直为神”单面木雕印版（朱英炯 摄）

来专注于收藏，不在乎做生意，但到了晚年又把东西卖出去了，理由是改善生活或者改善子孙的生活。

王世襄先生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早年间他收藏的东西是不卖的，朋友想用高价私底下转让，他都不怎么答应。结果到了晚年，他用这两条理由把自己的一部分藏品放到市场上拍卖了，非常可惜。

第三种是传承派。传承派有个特点，东西进来就带不出去。到了晚年，他们多半会把自己的藏品捐给公家，我的老师饶宗颐先

生就是这样的。

饶先生家族本是潮州首富，可惜抗战之后家里的东西都没了。饶先生后来在香港大学当教授，又到新加坡、美国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收藏，最后在晚年也就是他88岁的时候，把所有的藏书捐给了香港大学，藏在饶宗颐学术馆，也就是我在服务的单位。这批藏书有4万多册，其中古籍800多种，善本约170种，有三分之二是海内外孤本。另外他收藏的古琴有五六张，也是价值连城，饶先生把古琴无偿捐给家乡潮州的饶宗颐学术馆。

收藏之乐与收藏策略

收藏的乐趣在哪里？一些收藏家首先考虑的是学术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藏的东西变成知识。

以饶先生为例，饶家原有几尊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的白瓷佛像，后捐给了国家，现在全国收藏此类佛像四尊，有两尊是他家的。二战期间佛像没被弄坏，他很高兴，拿了两尊佛像的照片写了篇很重要的论文，后来研究宋瓷的人都要看这篇东西。他把自己的收藏变成了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快乐。许多学者都有这个特点，刚才提过的法国著名收藏家伯希和也是如此，他认为，学者研究某个课题，就要对那个课题有点收藏。我也秉承了这个传统。比

如，当我研究元代景教的十字铜牌时，我和助手收藏了一两件十字铜牌。可是后来研究发现，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元代的，在丝绸之路之上，十字铜牌早就流行了。我们都涨了知识，这个就是“乐”。

第二种“乐”是藏品有实用价值。其实我们现在收藏的大部分东西在古代是实用品，本来就有它的用途。花瓶是什么？养花的。那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古董花瓶养花？我鼓励大家把收藏的东西尽量利用起来，最好的收藏就在日用。天一阁的古籍是用来阅读的，把它利用起来，才有人气，古籍的生命才会更精彩。

第三种“乐”纯粹就是喜

欢。我记得沈从文先生说过，有一次有人到他家里去，看他收藏的一些瓶瓶罐罐，有的有裂缝，有的还缺了口。那人就说，这个东西缺了口，不值钱了，扔了吧。沈先生淡笑着回答，我喜欢，我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喜欢很重要。

最后一种“乐”，当然在于赚钱。那些会把收藏的东西拿去卖的人，他们的“乐”就是赚钱，但那是有条件的。这件东西赚了钱，他才有“乐”，不赚钱的话，他就没“乐”。赚钱这个乐趣，真正的收藏家大概可以不管。

我自己不算收藏家，但也玩一点收藏。我的收藏策略很简

单，首先是喜欢，凡是我收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第二是负担得起。什么叫负担得起？你看见一件东西很喜欢，价钱也是你在那一刻可以承担的，那就当机立断收回来。我有过痛苦的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旧书店看到一个元代的刊本，要价不算高，大概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当时我现金不够，已经傍晚了，我就想那明天再来吧。遗憾的是，它被我一个同学当场掏钱买走了。

第三个收藏策略是捡漏。如果一件东西的价格明显低于主流市场价，被你买了，这就是捡漏，捡漏的关键在于你要懂。比如，最近我在澳大利亚的网上书店买回来三套书，其中一套在中国内地可以算是孤本，那是乾隆皇帝下令朝廷印的一套满文教科书，对方开价

只相当于1万多港元。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珍贵，只是觉得价格明显偏低，而且满文的东西如今留下来不多，就当机立断地买了。之后我查资料发现，另一套完整的在东京大学，国家图书馆有十二分之一。

关于捐赠，我给自己定了几个标准：首先是捐给公家博物馆、图书馆；其次，捐赠过程规范化；再次，我捐的东西要对该馆有意义。譬如中国印刷博物馆曾经让我把收藏的雕版捐给他们，我说，不捐。为什么？因为同类型的雕版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太多了。我为什么捐给天一阁？一是因为我原籍宁波，二是希望我捐的东西能补天一阁的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缺。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主讲人名片

郑炜明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副馆长。亦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国学院教授，日本岛根大学亚太历史及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上古史、国学研究方法论、简帛学、词学、中华文学史、澳门学等。已刊学术著作35种，文学著作10种，期刊论文及书籍章节140余篇。